



发达地区农民土地转出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浙江省426份调研问卷的实证

徐美银

(南京邮电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3)

摘要:通过实地调研,建立结构方程模型,从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社会特征、区域特征和市场特征五个方面,对影响发达地区农民土地转出意愿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农户家庭收入水平及非农就业状况对其土地转出意愿影响最大,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农民社会保障水平、农民的年龄和受教育年限、农民对国家土地政策的认知程度和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也对农民土地转出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应该通过提高农民家庭收入,增加非农就业机会;提高农民的社会保障水平;提高农民受教育程度,加强宣传,深化农民对国家土地政策的理解;加强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建设,提高农民的土地转出意愿,推进农村土地顺利流转。

关键词:农民意愿;土地转出;土地流转;土地市场;结构方程模型;发达地区

中图分类号:F30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7465(2014)06-0097-09

现阶段,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经济发展阶段逐步演化,农村经济社会结构不断转型。以浙江省为例,2011年浙江省人均GDP为58665元,三次产业比例为4.9:51.3:43.8,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3071元,位居全国第一。^①在这一发展背景下,发达地区城乡一体化建设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实质是统筹城乡,通过打破传统二元经济体制的分割状态,努力在城乡统一的市场体系中,合理配置和高效使用城乡资源,包括劳动力资源、土地资源等。就土地资源的利用而言,随着经济发展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村土地合理流转以及农村土地适度非农化是一个必然趋势。尤其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民进入城镇工作和生活,农民阶层逐步分化,农村土地流转趋势日益加强。资料显示,近年来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速度有所加快,流转比例从2008年的8.7%逐步增加到2010年的13.0%。^[1]

然而,总体而言,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比例仍然较低,农村土地资源利用仍然处于较低水平。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农地小规模经营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以较为发达的长三角地区为例,农户拥有农地规模普遍偏小,经营规模在3亩以下的农户占64.23%。^[2]阻碍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一些学者着重从宏观角度进行了分析,如黄少安等指出,现有农地制度安排导致产权不清晰,使得公平与效率产生矛盾;^[3]李怀等认为,农地流转中的多重委托—代理结构导致了特权干预、股份制风险等制度失衡现象。^[4]虽然这些研究结论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是,笔者认为,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困境的根源在于微观方面,尤其在农户层面,表现为农户的土地流转有效供给不足。在现有制度环境约束下,理性的农户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主观上不愿意轻易转出土地,使得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有效供给不足,造成土地流转市场严重失衡。只有深入了解影响农户土地转出意愿的主要因素,才能有

收稿日期:2013-10-2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发达地区土地承包经营权市场化流转的机理、模式与政策研究——以江苏、浙江为例”(12YJA790156);江苏省教育厅“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项目

作者简介:徐美银,男,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管理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地资源管理。

① 数据来源于《浙江省统计年鉴(2012年)》。

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减少不合理约束,提高农户的土地转出意愿,保证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有效供给,实现土地流转市场的供求平衡。

因此,本文以浙江省为例,对发达地区进行实地调研,并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加以分析,深入研究影响农民土地转出意愿的主要因素,并据此提出一系列改革建议,推进我国农村土地顺利流转。

一、文献回顾、研究假说与理论模型

1. 文献回顾

农村土地流转问题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其中积累了大量的有益文献。归结起来,现有研究认为影响农户土地流转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非农就业对农户土地流转的影响。研究表明非农就业对农民土地流转有积极影响。王晓兵等指出,非农就业参与率直接影响了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5]许恒周等以南京市为例,认为农民非农收入与农地流转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但短期存在波动。^[6]但也有学者指出非农就业对土地流转的影响机理比较复杂,不能一概而论。如江淑斌等指出,劳动力非农就业与土地流转的关系因非农就业的动力而异,农业收入下降推动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可能抑制土地流转;而非农部门工资上涨拉动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则可以促进土地流转。^[7]

其二,农户对国家土地政策的了解程度以及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发育程度对农户土地流转的影响。曾福生的实证分析表明,农户对农地产权的认知度对其土地流转意愿具有显著影响。^[8]晋洪涛研究发现,农民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土地权属事实认知对农地流转有着显著影响。^[9]乔颖丽等认为,农户劳动力的机会成本、转出土地的租金决定了农户的土地转出意愿。^[10]

其三,农民社会保障程度对土地流转的影响。毛飞等认为,农村保险市场越完善,农户的土地转出意愿越强烈。^[11]翟辉等指出,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影响农户土地流转的主要因素。^[12]何京蓉等的实证研究表明,农村社会保障和风险防范机制不健全直接影响了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13]

其四,农户的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对其土地流转意愿和行为会产生直接影响。韩星焕等通过实证分析指出,农户的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个体特征是影响其土地流转的主要因素。^[14]韩菡等认为,家庭财富水平对农户转入土地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15]陆益龙指出,农户的受教育水平对其土地使用行为影响较大。^[16]罗必良等认为,农户的土地转出与农户禀赋具有状态依赖性。^[17]

其五,发达地区农户土地流转具有一系列特点。赵丙奇等认为,发达地区农村土地流转方式以转让和出租为主,农户流转土地的主要原因是自己耕种土地的效益太低。^[18]陈水生通过比较研究指出,发达地区农村土地流转在流转规模、政策创新、政府行为和农民意愿四个方面具有自身特点。^[19]

由此可见,影响农民土地流转意愿和行为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需要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归纳总结,并利用实地调研资料,通过计量分析,定量研究各个因素的影响程度。这样才能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全面把握影响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主要因素,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切实提高农民的土地流转意愿。

2. 研究假说与理论模型

(1) 研究假说

基于文献综述、理论分析及研究主题,本文提出假说模型,分析农民土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因素。假说模型以农民土地转出意愿为内生潜变量,以农户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社会特征、区域特征和市场特征为外生潜变量。其中,个人特征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特征包括家庭总人口、人均纯收入、非农收入占比;社会特征包括养老保障社会化程度、医疗保障社会化程度、农村合作社发展程度;区域特征包括地区人均纯收入、非农收入占比、城镇化水平;市场特征包括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农民土地政策认知程度。

根据假说模型,可以提出以下具有总—分关系的研究假设:

H1:农户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社会特征、区域特征、市场特征会对农民土地转出意愿产生影响;

H2:农户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均纯收入、家庭非农收入占比、养老保障社会化程度、医疗保障社会化程度、农村合作社发展程度、地区人均纯收入、地区非农收入占比、城镇化水平、农村土地市场发育程度、农民土地政策认知程度与农民的土地转出意愿有正相关关系;

H3:农户个人的年龄、家庭总人口数与农民的土地转出意愿有负相关关系。

(2) 理论模型

本文重点研究影响农民土地转出意愿的主要因素,变量本身具有明显的主观性,具有难以直接

测量以及难以避免主观测量误差的基本特征,适合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加以分析。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简称 SEM)作为一种现代统计分析工具,可以为难以直接测量的潜变量提供一个能够加以观测和处理、并将难以避免的误差纳入分析模型之中的方法。^[20]

结构方程模型中有两个基本模型:测量模型与结构模型。测量模型由潜变量与可测变量组成,反映潜变量与可测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构模型反映不同潜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① 一般地,SEM 由三个矩阵方程来表示:

$$\eta = B\eta + \Gamma\xi + \zeta \tag{1}$$

$$X = \Lambda_x\xi + \delta \tag{2}$$

$$Y = \Lambda_y\eta + \varepsilon \tag{3}$$

方程(1)为结构模型, η 为内生潜变量, ξ 为外生潜变量, ζ 为误差向量, B 和 Γ 为系数矩阵。结构模型通过系数矩阵 B 和 Γ 将内生潜变量与外生潜变量联系起来。

方程(2)和(3)为测量模型, X 为外生潜变量

的可测变量, Y 为内生潜变量的可测变量, Λ_x 为外生潜变量与其可测变量的关联系数矩阵, Λ_y 为内生潜变量与其可测变量的关联系数矩阵, ε 、 δ 为误差向量。通过测量模型,潜变量可由可测变量反映。

在本文的结构方程模型中,内生潜变量 η 为农民土地转出意愿,外生潜变量包括个人特征 ξ_1 、家庭特征 ξ_2 、社会特征 ξ_3 、区域特征 ξ_4 和市场特征 ξ_5 。

二、调研方案设计

1. 问卷设计

调研问卷围绕研究主题进行设计。按照研究假说和理论模型,从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社会特征、区域特征、市场特征、土地流转意愿六个方面设计紧密联系特征内容的相关问题,并采取通用的 5 点李克特量表设计。问卷初稿完成后,于 2012 年 2 月在浙江省临安市天目山镇进行小规模(样本数为 60)的预调研,并据此修订了调研问卷。正式调研问卷中所涉及变量的含义及取值情况见表 1。

表 1 变量含义及取值

变量类型	潜变量		可测变量		
	符号	含义	符号	含义	取值
外生潜变量	ξ_1	个人特征	X1	年龄	30 岁以下=1, [30,40]=2, (40,50]=3, (50, 60]=4, 60 岁以上=5
			X2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1, 初中=2, 高中(中专)=3, 大专=4, 大专以上=5
	ξ_2	家庭特征	X3	总人口	[1,3]=1, 4 人=2, 5 人=3, 6 人=4, 6 人以上=5
			X4	人均纯收入	0.5 万元以下=1, [0.5,1.0]=2, (1.0,1.5]=3, (1.5,2.0]=4, 2 万元以上=5
			X5	非农收入占比	[0,20]=1, (20,40]=2, (40,60]=3, (60,80]=4, (80, 100]=5
	ξ_3	社会特征	X6	养老保障社会化程度 ^a	[0,20]=1, (20,40]=2, (40, 60]=3, (60,80]=4, (80,100]=5
			X7	医疗保障社会化程度 ^b	[0,20]=1, (20,40]=2, (40,60]=3, (60,80]=4, (80,100]=5
			X8	农村合作社参加时间	未参加=1, 参加 1 年=2, 参加 2 年=3, 参加 3 年=4, 参加 3 年以上=5
	ξ_4	区域特征	X9	人均纯收入	0.5 万元以下=1, [0.5,1.0]=2, (1.0,1.5]=3, (1.5,2.0]=4, 2 万元以上=5
			X10	非农收入占比	[0,20]=1, (20,40]=2, (40,60]=3, (60,80]=4, (80, 100]=5
			X11	城镇化水平	[0,20]=1, (20,40]=2, (40,60]=3, (60,80]=4, (80,100]=5
	ξ_5	市场特征	X12	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建立时间 ^c	未建立=1, 建立 1 年=2, 建立 2 年=3, 建立 3 年=4, 建立 3 年以上=5
			X13	对农村土地政策了解程度	一点不了解=1, 较少了解=2, 一般了解=3, 较多了解=4, 非常了解=5
内生潜变量	η	农民土地转出意愿	Y1	已经转出土地比例 ^d	[0, 20]=1, (20, 40]=2, (40, 60]=3, (60,80]=4, (80,100]=5
			Y2	未来三年愿意转出土地比例 ^e	[0, 20]=1, (20,40]=2, (40,60]=3, (60,80]=4, (80,100]=5

注: a. 养老保障社会化程度=(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额+商业养老保险额)/养老保障总额; b. 医疗保障社会化程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额+商业医疗保险额)/医疗保障总额; c. 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建立时间可以用来衡量当地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发育程度,中心建立时间越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当地土地流转市场越成熟; d. 已经转出土地比例=已经转出土地面积/家庭承包土地总面积; e. 未来三年愿意转出土地比例=未来三年愿意转出土地面积/家庭承包土地总面积。

2. 样本选择和实地调研

浙江省地处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居全

国前列,工业化、城镇化水平较高,农村土地流转规模总体水平较高。同时,浙江省也存在着区域内经

① 所谓潜变量是指一些不能直接测量的变量,所以潜变量又被称为不可测变量。

济发展的不平衡,主要包括三大经济板块:浙东经济发达地区、浙中经济比较发达地区、浙西经济欠发达地区。因此,对浙江省农村土地流转改革进行研究具有典型意义。

本文选取浙东的杭州市、浙中的金华市、浙西的丽水市作为研究样本,采取分层逐级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于 2012 年 4 月进行实地调研,并于 2012 年 6 月进行了补充调研。在实地调研过程中,主要采取问卷调查和入户访谈相结合的形式,保证调研资料的准确性。具体样本包括杭州临安市天目山镇、潜川镇和富阳市高桥镇、洞桥镇,金华武义县桐琴镇、泉溪镇和东阳市湖溪镇、南马镇,丽水缙云县东方镇、大源镇和遂昌县云峰镇、妙高镇,每个镇随机抽取 2 个村,每个村选择 20 户符合条件的农户。此次调研共发放调查问卷 480 份,收回问卷 453 份,其中有效问卷 426 份。

三、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1. 样本农户基本特征

实地调研过程中,在选择样本农户时,充分考虑了农户的异质性特征,尽可能选择具有不同特征类型的农户,这样能够保证调研结果的一般性。样本农户的基本特征如表 2 所示。

表 2 样本农户的基本特征

	户主年龄 (岁)	户主受教育 年限(年)	家庭总 人口(人)	家庭年人均 纯收入(万元)
最小值	23	3	1	0.3
最大值	71	16	7	5.2
平均值	41.3	8.5	3.9	1.1
标准差	13.52	7.65	3.53	2.62

2. 样本农户土地流转意愿

浙江省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第二、第三产业发展迅速,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较高。在这一发展背景下,农民的非农就业机会不断增加,土地流转意愿普遍较高,具体见表 3 所示。

表 3 样本地区农户土地流转意愿(%)

样本地区	愿意流转土地			不愿意 流转土地
	愿意转出土地	愿意转入土地	合计	
杭州市	63.7	6.9	70.6	29.4
金华市	39.6	19.1	58.7	41.3
丽水市	11.8	26.9	38.7	61.3
平均值	38.4	17.6	56.0	44.0

从表 3 可以发现,样本地区平均 38.4% 的农户家庭愿意转出土地,17.6% 的农户家庭愿意转入土地,合计 56.0% 的农户家庭愿意流转土地。

从表 3 还可以发现:其一,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杭州市,农户土地流转意愿更为强烈,占比高达 70.6%,其中大多数农户愿意转出土地,愿意转入土地的农户则较少。这是由于当地第二、第三产业比较发达,农民的非农就业机会较多,同时农业的比较收益低,许多农户愿意转出土地全心从事非农产业。其二,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中等的金华市,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也处于较高水平,超过半数的农户家庭愿意流转土地,其中愿意转出土地的农户高于愿意转入土地的农户。这说明处于这一经济发展水平的农户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农户的异质性特征比较明显,一些农户的非农就业机会增加,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减弱,而另一些农户则依然主要依赖土地,主要依靠农业获取家庭收入。其三,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丽水市,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也相对较低,只有 38.7% 的农户愿意进行土地流转,其中愿意转入土地的农户超过愿意转出土地的农户 15.1%。这说明由于非农就业机会较少,农业收入依然是多数农户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这些农户家庭对土地的依赖程度依然较高,愿意通过转入土地适当扩大农业生产规模,提高土地经营收益。

四、实证分析结果

1. 样本的科学性检验

样本的科学性检验包括信度检验和效度检验。信度是指测量结果的一致性、稳定性。效度是指测量工具或测量手段能够反映测量事物的准确程度。只有保证测量结果的准确性,进一步探究潜变量之间的关系才有实质性意义。^[21] 本文对样本的信度和效度进行了检验,结果如表 4 所示。

从表 4 可发现,所有潜变量的建构信度值介于 0.745 至 0.837 之间,大于评价标准值 0.60;所有潜变量的抽取方差值介于 0.594 至 0.652 之间,大于评价标准值 0.50。说明样本具有较好的信度。

从表 4 还可以发现,所有可测变量在相应潜变量上的因子载荷量都比较显著($t>1.96$),说明测量工具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

表 4 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

变量	因子载荷 ^a	t 值	建构信度	抽取方差
个人特征	—	—	0.766	0.622
X1	0.712	—	—	—
X2	0.859	7.53	—	—
家庭特征	—	—	0.813	0.596
X3	0.615	—	—	—
X4	0.838	10.23	—	—
X5	0.841	9.21	—	—
社会特征	—	—	0.745	0.594
X6	0.801	—	—	—
X7	0.739	8.27	—	—
区域特征	—	—	0.837	0.631
X9	0.783	—	—	—
X10	0.769	5.87	—	—
X11	0.830	6.31	—	—
市场特征	—	—	0.789	0.652
X12	0.786	—	—	—
X13	0.828	9.01	—	—
农民土地 转出意愿	—	—	0.746	0.597
Y1	0.834	—	—	—
Y2	0.706	6.30	—	—

注:a. 每个潜变量第一组可测变量的路径系数默认值设为 1。

建构效度包括收敛效度和区别效度。为了得到区别效度,运用 SPSS16.0 软件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见表 5 所示。本文采用荣泰生(2009)推荐的方法来检验区别效度,将“每个潜变量的抽取方差”与“此潜变量与其他潜变量的相关系数的平方”进行比较。表 5 中对角线上的数值为每个潜变量的抽取方差,非对角线上的数值为不同潜变量间相关系数的平方。

表 5 潜变量之间的区别效度

潜变量	ξ_1	ξ_2	ξ_3	ξ_4	ξ_5	η
ξ_1	0.622					
ξ_2	0.36	0.596				
ξ_3	0.23	0.26	0.594			
ξ_4	0.11	0.20	0.13	0.631		
ξ_5	0.07	0.09	0.14	0.19	0.652	
η	0.32	0.30	0.12	0.15	0.17	0.597

从表 5 可以发现,所有对角线上的数值都大于非对角线上的数值,说明本研究测量工具的区别效度较好。

因此,本研究中测量工具的收敛效度和区别效度均较好,说明本研究量表具有较好的效度。

2. 模型拟合结果

(1)违反估计检验

本文运用 Amos7.0 软件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在评价模型拟合度之前,必须先检查是否产生了“违反估计”,以检验模型所输出的标准化系数和测量误差值是否超过可接受的范围。^[22]对模型

进行拟合时发现,变量农村合作社参加时间(X8)的估计值标准化系数超过 1,且误差变异数为负值,表明模型产生了违反估计。本文采用渐进的方式对模型进行了修正,删除了农村合作社参加时间这一因素,最终得到了优化模型。对此的可能解释是,农户农村合作社参加时间这一变量已经体现在农户家庭特征的人均纯收入等变量之中,不适合再作为一个独立变量处理。

(2)整体模型适配度检验

整体模型适配度检验结果见表 6 所示。

表 6 整体模型适配度检验结果

统计检验指标	检验结果	适配标准	模型是否适配
χ^2/df	1.360	<2.00	是
RMSEA	0.015	<0.05	是
CFI	0.971	>0.90	是
GFI	0.955	>0.90	是
AGFI	0.923	>0.90	是
NFI	0.962	>0.90	是

表 6 表明,模型的整体拟合度较好,说明本研究提出的假说模型与实际调研数据的拟合情况良好,即模型的外在质量较好。

(3)模型路径分析

修正模型的整体拟合指标通过检验后,可以进入模型的路径分析阶段。本文运用 Amos7.0 软件的极大似然估计法(Maximum Likelihood, ML 法)进行分析。ML 法要求大样本并且观测数据符合多变量正态性。在检验可测变量是否符合正态分布时,要求偏度系数和峰度系数都接近于 0。本模型偏度系数和峰度系数基本接近于 0,说明可测变量基本呈正态分布,同时样本数量足够大,因此适合运用 ML 法进行路径分析。

模型路径分析结果见表 7 所示。

结构模型路径分析结果表明,农户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社会特征、区域特征和市场特征对其土地转出意愿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五个特征潜变量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 0.317、0.565、0.349、0.471 和 0.208,说明农户的家庭特征对其土地转出意愿影响最大,其余按照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区域特征、社会特征、个人特征和市场特征。对此的解释是:第一,现阶段农户的生产经营决策更多地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土地转出意愿及其行为决策也不例外,因此家庭特征对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影响程度最大;第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直接决定了当地大多数农户家庭的经济发展状况,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户的社会保障程度,因此,

表 7 模型路径分析结果

模型	路径	标准化系数
结构模型	$\xi_1 \rightarrow \eta$	0.317 **
	$\xi_2 \rightarrow \eta$	0.565 ***
	$\xi_3 \rightarrow \eta$	0.349 **
	$\xi_4 \rightarrow \eta$	0.471 *
	$\xi_5 \rightarrow \eta$	0.208 *
测量模型	$\xi_1 \rightarrow X1$	-0.712 **
	$\xi_1 \rightarrow X2$	0.859 **
	$\xi_2 \rightarrow X3$	-0.615
	$\xi_2 \rightarrow X4$	0.838 **
	$\xi_2 \rightarrow X5$	0.841 ***
	$\xi_3 \rightarrow X6$	0.801 ***
	$\xi_3 \rightarrow X7$	0.739 **
	$\xi_4 \rightarrow X9$	0.783 ***
	$\xi_4 \rightarrow X10$	0.769 *
	$\xi_4 \rightarrow X11$	0.830 **
	$\xi_5 \rightarrow X12$	0.786 *
	$\xi_5 \rightarrow X13$	0.828 **
	$\eta \rightarrow Y1$	0.834 ***
	$\eta \rightarrow Y2$	0.706 ***

注：*、**、*** 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1%、5%、10%。

区域特征、社会特征对大多数农户的土地转出意愿具有共同性的影响,影响程度较大;第三,个人特征中可能包含了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两个相反方向的影响因素,年龄的影响为负,受教育程度的影响为正(测量模型的路径分析结果证明了这一结论),最终导致个人特征对土地转出意愿的影响程度降低;第四,土地市场发育程度对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促进作用,即土地市场会为那些需要流转土地的农户提供服务支持,而对那些不需要流转土地的农户影响则比较有限,因此,市场特征对农户土地转出意愿的影响程度较小,农户更多地会根据自身家庭状况等因素决定是否转出土地。以上分析结果充分证明,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说 1 是成立的。

测量模型路径分析结果表明:

(1)内生潜变量方面,可测变量农户家庭已经转出土地比例(标准化载荷系数为 0.834)对农户土地转出意愿的影响程度较大,而可测变量农户家庭未来三年愿意转出土地比例(标准化载荷系数为 0.706)较小。这一点不难理解,已经转出土地比例越大表明农户过去已经产生了比较强烈的土地转出意愿并将这种意愿付诸于行动,而未来三年愿意转出土地比例只是表明农户家庭对未来的土地转出意愿存在一定的预期。同时还发现,两个可测变量的影响方向一致,均为正,说明农户过去已经转出土地比例越高,未来三年转出土地的意愿会

有所增强。

(2)个人特征方面,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对其土地转出意愿影响强烈,标准化载荷系数为 0.859,符号为正。农民的受教育程度越高,人力资本提升越快,越容易从事复杂的非农产业,获取更高的个人收益,因此放弃土地的可能性越大,土地转出意愿越强。农民的年龄对其土地转出意愿具有消极影响,标准化载荷系数为-0.712,符号为负。通常情况下,农民的年龄越大,越不容易从事非农产业,对土地的依赖程度越高,土地转出意愿越弱。同时,年龄越大的农民,风险规避倾向增大,对稳定的农业生产收益偏好增强,更不愿意转出土地。

(3)家庭特征方面,可测变量家庭非农收入所占比例、家庭人均纯收入两个因素对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影响程度相当,标准化载荷系数分别为 0.841 和 0.838,均为正。因为农业生产的比较收益偏低,所以通常情况下,家庭非农收入所占比例越高也意味着家庭人均纯收入越高,两者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关系,两者都对农户土地转出意愿产生积极影响。家庭非农收入所占比例越高、家庭人均纯收入越高,意味着农户对土地的依赖程度越低,其土地转出意愿越强。可测变量家庭总人口则对农户土地转出意愿产生负面影响,标准化载荷系数为-0.615,但不显著。一般而言,家庭总人口增加,家庭人均纯收入可能会降低,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增加;同时,家庭总人口越多,意味着家庭成员劳动分工的可能性越大,部分成员从事非农产业,其他成员从事农业生产,实现家庭内部的兼业化生产经营,因而不会轻易转出土地。但是,总人口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如果总人口中劳动力所占比例较高,那么家庭人均纯收入反而会会增加,土地转出意愿会增强。所以,家庭总人口对农户土地转出意愿的总体影响比较复杂。调研访谈资料充分证实了这一实证分析结果。

(4)社会特征方面,可测变量家庭成员养老保障社会化程度(标准化载荷系数为 0.801)对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影响程度较大,而医疗保障社会化程度(标准化载荷系数为 0.739)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小。相对而言,许多农户家庭更关心成员的养老保障,只有健康状况较差的农民,才会关心医疗保障,所以,养老保障的社会化程度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影响程度较大。同时还发现,两个可测变量的影响方向一致,均为正,说明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社会化程度存在着相互一致的关系,都对农户土地转出意愿产生积极影响,保障社会化程度越高的农户家

庭,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会得到一定程度的弱化,农户的土地转出意愿越强。

(5)区域特征方面,三个可测变量都对农户土地转出意愿产生积极影响。区域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越高,说明区域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区域农民非农收入占比越高,说明当地非农就业机会较多;区域城镇化水平越高,说明更多的农村居民进入城镇就业生活,并且三个因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关系。这些因素都会提高农户的土地转出意愿。其中,地区城镇化水平影响程度最大,标准化载荷系数为0.830;当地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非农收入占比影响程度相当,标准化载荷系数分别为0.783和0.769。地区城镇化水平越高,意味着离开农村进入城镇就业生活的农民数量越多,这些农民本身具有较强的土地转出意愿,因此城镇化水平对农民土地转出意愿的影响最为直接,影响程度也最大。区域农民人均纯收入、非农收入占比两个因素,则决定了当地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农民对农业生产的依赖程度,也会对农户土地转出意愿产生相当影响。这一实证分析结果与调研时所掌握的实际情况高度一致。

(6)市场特征方面,可测变量农户对农村土地政策了解程度(标准化载荷系数为0.828)对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影响程度较大,而土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标准化载荷系数为0.786)的影响程度较小。理论和实证研究均表明,农民更多的是根据自身对外部环境的主观认知进行决策的,在涉及土地问题时,农民也毫无例外地会根据自身对农村土地政策的了解程度进行决策。农民如果对国家土地政策了解越多,理解越深,就会更加放心地转出土地,转出土地意愿就会更加明确和强烈。土地流转市场可以为农民流转土地提供平台,解决土地流转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纠纷。土地流转市场越成熟,管理和服务质量越高,土地流转纠纷就越少,土地流转过程中的交易费用也越少,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农民的土地转出意愿。实地调研时发现,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发育相对成熟的地区,农民土地流转意愿(包括土地转出意愿)也越强。

以上测量模型路径分析结果充分证明,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说2和假说3是成立的。

五、研究结论及启示

本文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

明,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社会特征、区域特征和市场特征等潜变量均对农民土地转出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具体而言,农民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非农收入占比,家庭成员养老保障社会化程度、医疗保障社会化程度、区域农民人均纯收入、非农收入占比,城镇化水平、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农民对国家土地政策了解程度等可测变量对农民土地转出意愿产生积极影响;随着年龄的增加,农民的土地转出意愿会逐步减弱;家庭总人口越多的农民家庭,土地转出意愿越弱。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可以得出一些有益启示:

第一,提高农户家庭收入水平,增加稳定的非农就业机会,是提高农民土地转出意愿最为有效的措施。农户从来都是非常理性的,^[23-24]其决策和行为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成本收益的比较原则。在是否转出土地的问题上,只有那些收入水平较高、具有稳定的非农就业机会、能够获取较大非农收益(大于经营土地的机会成本)的农户,才会产生土地转出需求。因此,需要通过推进工业化、城镇化,通过工业支持农业、城市反哺农村,来提高农民收入,创造非农就业机会,提高农民的土地转出意愿。现阶段,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要着力优化产业结构,创造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保证农业转移人口充分就业,实现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同时,还要逐步消除城乡就业歧视,保证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同工同酬,切实增加农民家庭的收入水平。

第二,加快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效推进城镇化建设。发达地区尤其要注重区域内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在保证先进地区经济发展速度的同时,采取措施逐步加快后进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同时,需要切实推进区域的城镇化水平。只有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提高了,才能增加所有农民家庭的收入水平,提高非农收入所占比例,从根本上提高大多数农民的土地转出意愿。

第三,提高农民的社会保障程度,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农民的土地转出意愿。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土地对于农民家庭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发挥了重要的社会保障功能。只有切实提高农民的社会保障程度,扩大农民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才能逐步弱化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降低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提高农民的土地转出意愿,增加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有效供给。一方面,通过增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数额,从整

体上提高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另一方面,完善各项社会保险制度安排,保证农业转移人口能够充分享有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同时,大力发展各种形式的农村商业保险,增加农村居民社会保险的选择范围,提高其社会保障水平。

第四,提高农民受教育水平,加强农业转移人口的非农就业技能培训。农民的受教育程度提高,一方面可以提高自身对外部事物的认识能力,也能够提高对政策的解读能力,另一方面可以增加人力资本内涵,寻找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这些都有助于农民摆脱对土地的依赖,提高土地转出意愿。一方面,加大农村教育投入,改善农村教育条件,切实普及农村义务教育,提高农民整体的受教育水平;另一方面,政府有关职能部门要根据非农就业岗位的实际要求,定期对农业转移人口进行各种技能培训,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城镇就业适应性。

第五,加强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建设,加强宣传、提高农民对国家土地政策的了解程度,提高农民土地转出意愿。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是农民进行土地流转的重要平台,它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将需求与供给有效衔接起来,减少土地流转的交易费用;也可以帮助农民解决土地流转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纠纷,使农民土地流转行为受到法律的保护;还可以强化政府对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管理,提高政府的服务水平。实践证明,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比较高的地方,农民的土地流转行为就比较规范,土地流转比例就比较大。因此,应该采取措施,加强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建设,提高农民土地流转意愿。同时,地方政府要加强宣传,深化农民对国家土地政策的了解,保证农民能够在自愿基础上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进行土地流转决策,减少农民不必要的顾虑,提高农民的土地转出意愿。

参考文献:

- [1] 赵阳. 城镇化背景下的农地产权制度及其相关问题[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1(2).
- [2] 史清华, 徐翠萍. 农户家庭农地流转行为的变迁和形成根源——1986—2005年长三角15村调查[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7(3).
- [3] 黄少安, 刘明宇. 公平与效率的冲突: 承包制的困境与出路——《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法经济学解释[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8(2).
- [4] 李怀, 高磊. 我国农地流转中的多重委托—代理结构及其制度失衡解析——从重庆、四川、广东等省份土地产权流转案例中得到的启示[J]. 农业经济问题, 2009(11).
- [5] 王晓兵, 侯麟科, 张砚杰, 等. 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发育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J]. 农业技术经济, 2011(10).
- [6] 许恒周, 郭玉燕. 农民非农收入与农村土地流转关系的协整分析——以江苏省南京市为例[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1(6).
- [7] 江淑斌, 苏群.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与土地流转——基于动力视角的研究[J]. 经济经纬, 2012(2).
- [8] 曾福生. 农地产权认知状况与流转行为牵扯: 湘省398户农户样本[J]. 改革, 2012(4).
- [9] 晋洪涛. 以农地权属为视角的土地流转行为研究——基于河南455个农户样本的调查[J]. 社会科学战线, 2011(5).
- [10] 乔颖丽, 岳玉平. 土地流转中农业规模经营组织类型的经济分析——基于农户与规模经营组织双向层面的分析[J]. 农业经济问题, 2012(4).
- [11] 毛飞, 孔祥智. 农地规模化流转的制约因素分析[J]. 农业技术经济, 2012(4).
- [12] 翟辉, 杨庆媛, 焦庆东, 等. 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影响因素分析——以重庆市为例[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1(2).
- [13] 何京蓉, 李炯光. 农村土地流转状况调查与分析——基于三峡库区7个乡镇23个村的调查[J]. 经济问题探索, 2010(3).
- [14] 韩星焱, 田露. 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以吉林省为例[J]. 吉林农业大学学报, 2012(2).
- [15] 韩蕊, 钟甫宁. 劳动力流出后“剩余土地”流向对于当地农民收入分配的影响[J]. 中国农村经济, 2011(4).
- [16] 陆益龙. 农户的耕地使用行为及其影响——基于2006CGSS的实证分析[J]. 江苏社会科学, 2012(2).
- [17] 罗必良, 汪沙, 李尚蒲. 交易费用、农户认知与农地流转——来自广东省的农户问卷调查[J]. 农业技术经济, 2012(1).
- [18] 赵丙奇, 周露琼, 杨金忠, 等. 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土地流转方式比较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对浙江省绍兴市和安徽省淮北市的调查[J]. 农业经济问题, 2011(11).
- [19] 陈水生. 土地流转的政策绩效和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东中西部三地的比较研究[J]. 社会科学, 2011(5).
- [20] 吴明隆. 结构方程模型——AMOS的操作与应用[M].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9.
- [21] 易丹辉. 结构方程模型方法与应用[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 [22] 荣泰生. AMOS与研究方法[M]. 重庆: 重庆大学出

版社,2009.

[23] Schultz, Theodore W. 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M].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4.

[24] Popkin S. The Rational Peasa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ral Society in Vietnam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责任编辑:刘浩)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Farmers Wishes about Transfer of Rural Land in Developed Areas

XU Meiyin

(Marxism College,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Nanjing 210046, China)

Abstract:Based on a field survey, an SEM is made to analyze som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farmers wishes about the transfer of rural land from five aspects which include personal feature, family feature, social feature, regional feature and market feature. The results are: the income level and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have the biggest effect on the farmers wishes about transfer of rural land. Meanwhile some factors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farmers wishes: regional economy and urbanization level, farmers social security level, age and education level, the level of cognition on rural land policy and the degree of rural land circulation market. So we must take some measures to enhance the farmers wishes about transfer of rural land. The measures include increasing the farmers income, giving more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raising the farmers social security level, helping the farmers understand the rural land policy better,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land circulation market and enhancing their willingness of transfer. Thus we can push the rural land circulation.

Key words:Farmers Wishes; Transfer of Rural Land; Land Circulation;Land Market;SEM; Developed Areas

(上接第 88 页)

of private ownership most of the time in traditional society, and there are all sorts of land markets and a variety of transaction. Briefly,land property rights in traditional China is compound in nature. At the levels of country, village community and private ownership, land property rights are corresponding to political property rights, social (cultural) property rights and economic property rights. The perspective of three-level recognition on traditional Chinese land property right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urrent issues of land property rights in rural China.

Key words:Traditional China; Rural Land Property Rights; Property Right Nature; Compound Property Rights